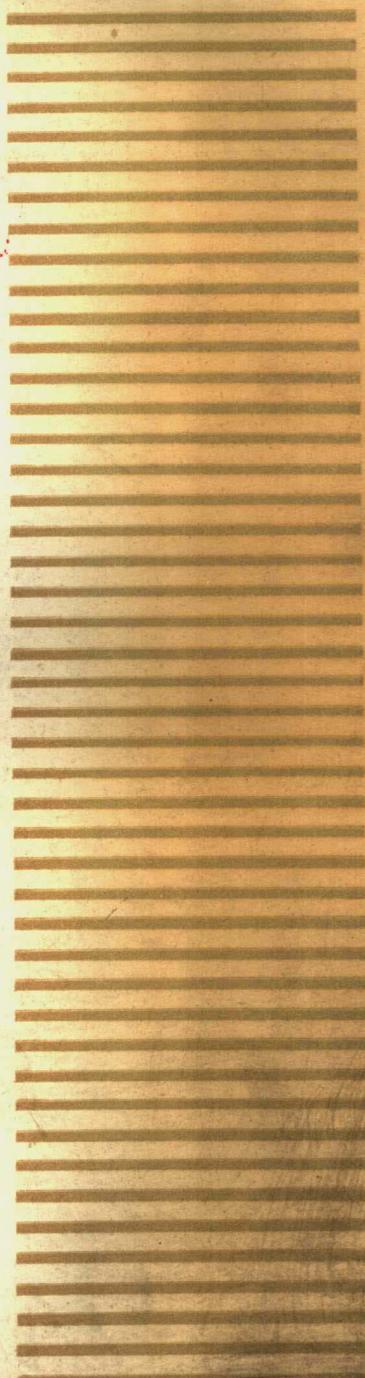


语文论丛

2



语 文 论 从

(第 2 辑)

上海市语文学会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 1983 •

语 文 论 丛

(第 2 辑)

上海市语文学会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 字数 381,000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700 本

统一书号：9150·53 定价：1.45 元

中国语言学报 1981年第1期
总第12期

目 录

关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问题	吴文祺(1)
试论语言的模糊性和明晰性	秦晓东(4)
漫谈句子	周斌武(13)
语言心理与非语言思维	唐建(21)
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王德春(31)
思维能脱离语言存在吗?	陈秀珠 吴勇毅(37)
有没有脱离语言的思维?	陶基本(44)
关于语言学史分期的标准问题	赵蒙良 董达武(47)
试论江永的语言学思想	李恕豪(55)
《墨经》语言学理论探讨	胡奇光(61)
从古今声母的演变和方言声母的异同看《切韵》声母系统的综合性	周明梁(67)
中古汉语方言中的鱼和虞	潘悟云(78)
上古汉语的声调	杨剑桥(86)
音转刍论	俞允海(96)
《广韵》中几个吴方言词的探究	汪寿明(103)
研究普通话的新途径	谢天蔚(105)
说“端”字义	李静远(111)
《祖堂集》中的疑问代词	孙锡信(122)
试谈汉语里的双宾语	余志鸿(130)
谈谈“特别是”之类的性质和意义	叶景烈(140)
漫谈“把”字句	杜高印(145)
试论汉语动词和形容词的重迭形态	申小龙(152)
试论动词谓语句的定型问题	范晓(162)

重读吕叔湘先生的《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	朱昌(172)
试论移觉修辞手法.....	李金苓(177)
关于借代的性质范围.....	林文金(185)
“对偶”新议.....	邓明以(193)
简论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方向	濮侃 胡范铸(198)
解放后修辞学研究述评	宗廷虎(202)
上海话单音动词举例.....	许宝华 汤珍珠 钱乃荣(209)
高淳方言调查报告.....	顾逸明(223)
中山石岐方言的南蓢地区差异	阮恒辉(235)
(试论声韵字母.....	李公宜(248)
七百多个最常用汉字在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应用.....	周寿令(254)
略论汉语拼音中的同音词问题	陈晨(260)
词典学的对象和任务.....	陈炳退 范崇俊(268)
关于编纂少年儿童语词词典的探讨.....	今丁(276)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al Board
Editorial Office	Advisory Board
YUWEN LUNCONG	
(Philological Studies)	
Contents	
Some Aspects of Traditional Philology.....	Wú Wēiqí (1)
On the Ambiguity and Clarity of Language	Gǔ Xiǎođōng (34)
A Few Remarks on the Sentence.....	Zhōu Bínwǔ (13)
Linguistic Psychology and Non-Linguistic Thinking	Tāng Jīn (21)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hought.....	Wáng Déchún (31)
Can Thought Exist in Isolation from Language?	Chén Xiùzhū and Wú Yǒngyì (37)
Is There Any Thought Divorced from Language?	Táo Shíben (44)
Criteria in the Epoch Division of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Zhào Méngliáng and Dōng Déwǔ (47)
Comments on Jiang Yong's Views of Linguistics.....	Lǐ Shùhào (55)
An Inquiry into Linguistic Theories in Mòjīng.....	Hú Gīguāng (61)
An Inquiry Into the Composite Nature of the Initial System in Qiéyán in View of its Historical Changes and Diversity in Modern Chinese.....	Zhōu Mingliáng (67)
Dialects	Zhōu Mingliáng (67)
“魚” (Yú) and “虞” (Yú) as Represented in Middle Chinese Dialects	Pān Wuyún (78)
Tones in Ancient Chinese.....	Yáng Jīngqíáo (86)
A Preliminary Study of Sound Shifts	Yú Yúnhǎi (96)
An Investigation of Some Wu-Dialect Words in Guǎngyùn...Wāng Shòumíng (103)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utonghua	Xiè Tiānwèi (105)
On the Semantic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端” (duān)	Lǐ Jīngyuǎn (111)
Interrogative Pronouns in Zǔtángjí	Sūn Xīxìn (122)
On the Double Objec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Yú Zhìhóng (130)
On the Character and Meaning of Such Phrases as “特別是” (tèbiéshì)	Yè Jǐngliè (140)
A Few Remarks on the Sentences Containing the Word “把” (bǎ)	

.....	Dù Gāoyìn (145)
On the Morphological Overlapping of Chinese Verbs and Adjectives	
.....	Shēn Xiǎolóng (152)
On the Patterning of the Sentence Containing a Verbal Predicate ... Fàn Xiǎo (162)	
Reflections on Mr LÜ Shū-xiāng's Article <i>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and Syntac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i>Zhū Chāng (172)	
On the Rhetorical Device: Transfer of Feeling Lǐ Jīnlíng (177)	
The Character and Range of MetonymyLín Wénjīn (185)	
New Views on AntithesisDèng Míngyí (199)	
A Brief Survey of the Orientation of Research Work in Chinese Rhetoric	
.....Pú Kǎn and Hú Fānzhù (198)	
Comments on Rhetorical Studies since Liberation Zōng Tínghǔ (202)	
Monosyllabic Verbs in Shanghai Dialect	
.....Xǔ Bǎohuá, Tāng Zhēnzhū and Qián Nǎitóng (209)	
A Fieldwork Report on the Gaochun DialectYán Yímíng (223)	
Phonetic Variations of the Dialect of Shí QÍ Town in ZHĒNG Shān County	
as Represented in the District of Nán Lǎng.....Rúǎn Hénghū (236)	
On the Use of Phonetic Letters in Chinese Phonological Studies ...Lǐ Gōngyí (248)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Most Common Seven or More Chinese Characters	
in Handling InformationWu Zhōu Shǒulíng (254)	
On the Problem of Homophones in Chinese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Chén Chén (260)	
Aims and Tasks Involved in Lexicography	
.....Chén Bǐngtiáo and Fàn Chéngjùn (268)	
An Inquiry into the Compilation of Dictionaries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for Young Children.....Jīn Dīng (276)	

关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问题

吴文祺

传统语著文字学，是指音韵、训诂、文字等学科而言。叶圣陶先生说：“我国自古以来，在语言学的某些方面，如文字、训诂、音韵都有了不起的成就。近三百年来的音韵研究，如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还有章太炎的《章氏丛书》中关于方言、古韵的几种书，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可以说，我国传统的语言学有它的特点，有独到之处。……我们自己有的东西，不要丢掉，不要妄自菲薄；我们短缺的东西，就老老实实地向人家学习，不要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见1980年9月《光明日报》、《北京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他的话讲得很全面，为研究语言文字的人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我们认为研究任何学术，不可能从零出发。继承和创新是辩证的统一。但在历史上的某一具体阶段，由于别的因素的干扰和破坏，可能发生倒退的现象。如我国解放前在蒋介石统治时期，解放后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德国、意大利在法西斯统治时期，都出现过文化学术倒退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流，只要干扰、破坏的因素一消失，各种学术又迈步前进了。”

现在我们研究语言文字的条件较之清代朴学家好得多了。我们语言文字工作者，应该较之前人作出更大的成绩和贡献。现在较之前人，至少是下列几个方面的条件好得多了。

第五、我们今天看到的好多资料，是清代乾嘉学者所没有看到过的。如一八八九年安阳出土的甲骨，不特可以纠正《说文》解释文字之误，而且可以考证殷商的历史，补《世本》、《史记》所未备。一九〇〇年敦煌鸣沙山莫高窟发现了唐写本《切韵》残卷，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残卷，《玄应音义》残卷和群经残卷，均被帝国主义分子掘藏而去。罗振玉从法人伯希和那里得到影印照片三百余枚，又购致外国人挑剩下来的残卷数千卷，编成《佚籍残经目录》，并以唐写本残卷经籍，与刻本作了校勘，发表于《国学丛刊》。一九〇八年匈牙利人斯道因在新疆、甘肃一带盗掘汉晋木简一千余枚。一九一三年罗振玉从法人沙畹得到了复印本，与王国维共同考证，出版了《流沙坠简》。解放以后出土的文物更多了，五十年

代初，湖南长沙出土了三批战国时的楚简和缯书。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两个写本，《战国策》、《周易》、《易说》以及《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这大批帛书，字体为篆隶两种，抄写的年代是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后，汉字由篆向隶演化的过渡阶段。帛书中的简体字、同音假借字很不少。这些对于研究西汉初期文字的发展以至汉语音韵等都是极珍贵的资料。一九七五年底至一九七六年春，湖北云梦出土了一千余支秦代竹简。一九七六年陕西扶风发现了窖藏铜器一百〇三件，有铭文的七十四件。其它如山西、陕西出土的周代甲骨，打破了过去有字甲骨一定是殷代卜辞的旧说，这些都是前人所未见的东西。

第三、关于上古汉语是不是有复声母的问题，音韵学家还有争论。但是从形声字中有些特殊谐声现象看来，塞音[p-]、[t-]、[k-]经常和边音[l-]互谐：如裸[l-]从果[k-]声，路、洛、略、赂[l-]从各[k-]声；兰、阑、谰[l-]从柬[k-]声；涼、谅[l-]从京[k-]声；懔、廉[l-]从禀[p-]声；这些塞音和边音互谐的现象，相当普遍，既不是[p-]、[t-]、[k-]变[l-]也不是[l-]变[p-]、[t-]、[k-]，因为这种演变在语音史上是很少见到的。这和舌上音和舌头音互谐，轻唇音和重唇音互谐，喻四和定母互谐，喻三和匣母互谐，娘、日二母和泥母互谐，是两回事，不能执彼以例此。所以英人艾约瑟(Edkins)认为这是上古汉语具有复声母之证。到后来由于复声母的偏失，于是才产生了这种不寻常的谐声现象。又如上古汉语中有些词，似乎也和复声母有关，如《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仪礼·大射仪》：“奏狸首”，郑注“狸之言添来也。”“不律”和“不来”可能是上古复声母[pl-]的遗迹。再以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比较研究，也有蛛丝马迹可寻：如四川彝语“风”叫[brum]，上古汉语“风”读重唇音[p-]，而从风得声的嵒读[l-]，按照复声母偏失的规律，还原到上古音，“风”读[pl-m]，和彝语[brum]有一脉相通之处。傣语“孔”叫[kluang]，与汉语方言孔曰“窟窿”相合；兼字读[klem]，和汉字廉[l-]从兼声[k-]相合；变字读[plien]，和汉字變[p-]从變[l-]声相合。再拿别国的借词来说，宋孙穆《鸡林类事》说，高丽方言“笔曰皮卢”[bl-]，和上古汉语“不律谓之笔”[pl-]相对应；“风曰孛缆”[bl-m]，又和上古汉语“风”的读音[pl-m]相对应。

第四、自然科学知识的广泛运用。如用物理学的知识来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物学的知识来解释语音的生理基础；用地质学的知识和放射性炭素测定法来考定出土的甲骨、铜器的年代；用仪器齿轮发音器、渐变音高管、共鸣管、浪纹计……来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的性质及其在演变中的相互关系；用电子计算机来计算作品中词汇出现的频率和两种不同语言的对译等等。这些都是清代朴学家没有接触过的新方法。

第五、在封建社会，研究学问，大都是闭门造车，不相问闻。即使有讨论，也只在少数几个人之间进行，范围很小。段玉裁在一七六六至一七六七年发明上古音支、脂、之分为三部。一七六九年将此说就正于其师戴震，一七七三年戴震致书段氏承认他的创见。一七七六至一七八〇年，王念孙独立发明支、脂、之三部之分。江有诰未见段书，也分東、脂、之为三。他们彼此之间，互不通气，每人都从头研究起，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现在不再走闭门造车的老路，而是走集体讨论的大道。集体讨论，有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之益，无抱

残守阙、坐井观天之弊。这种讨论会，范围可大可小，可以在一个省、市举行，也可以集合全国的或国际的专业工作者在一定的地点举行。

第六、关于古音音值的拟测。清代朴学家研究古韵，大多数只限于分部的工作，而不能考出每一韵部的读音。~~且注以水、鱼、虞之当分为三，而不知道怎么读法~~。他的《答江晋三论韵书》说：“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戴震是第一个注意古韵音值的人，他的古韵韵部都用零声母字标目，如阿（麻部）、乌（鱼部）、堦（铎部）等，这个古韵标目，就代表他所假定的古韵音值。章炳麟的《古韵二十三部音准》，也是描写二十三部的音值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用汉字来标音，不可能显示一个音节的音素，所以还不够精密。后来有人用音译梵文来研究汉语古音，就比较明确得多了。在国内用文字发表提倡的，始于钢和泰（A. Von Stael-Holstein）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接着汪荣宝发表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从梵文译音中拟测这些韵的古读。他的结论是：“唐宋以上，凡歌戈韵字皆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金虞模之字亦皆读[a]音，不读[u]或[e]音”。~~反顾炎武以来的古无端韵的旧说，可说是一个创见，但这个结论，失之笼统。因为梵文译音，只能用来考证汉代的读音，不能用来考证汉以前的读音。《诗经》用韵，歌戈部的字和鱼虞模部的字界限分明，显然不是同于韵部。钱玄同加以修正说：“我以为战国以前所谓西周和春秋的时候，~~鱼虞模~~的字不读[a]韵，因为三百篇中~~鱼虞模~~部的字和歌戈部的字划然有别，不相通用。所谓知道它们并不同韵。若那时~~鱼虞模~~部读[a]韵，则歌戈一定不读[Y]韵。至于汉代的译文，则~~鱼虞模~~和歌戈往往通用，所以说那时他们都读[a]韵”。~~此外，别国借用的汉字读音如日本的吴音和汉音，高丽译音，越南的汉越语等，都可以提供我们拟测古音音值的参考。

第七、外国汉学家的著作，如欧洲的马伯乐、高本汉、伯希和、杜百胜(Dobson)、马悦然(Malmqvist)、奥德利古尔(Haudricourt)等，日本的桥本万太郎、藤堂明保、鸟居久靖、波多野太郎等关于汉语方面的论文和书籍，虽然不能视为定论，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八、解放后，党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设立了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加强对国内兄弟民族语言的学习和研究。最近又成立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研究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古藏文、古蒙文、八思巴文、纳西文、傣文、彝文等十六种古文字。这不仅对语言文字学的发履起推动作用，而且对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一切学术都是发展的，语言文字学也不例外。从研究的资料说，现在比清末更丰富了；从研究的范围说，现在比清代更扩大了；从研究的方法说，现在比清代更精密了。因此，凡是停滞的观点、顶峰的观点，无所作为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从上面所谈到的几点看来，我们传统语言文字学是有光明灿烂的前途的。限于水平，一定有许多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1日。本文系作者在1956年1月10日“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原稿有删节，本文据《人民日报》社论编辑部整理。原稿标题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前途》，刊于《人民日报》，1957年1月1日。附注：本文系作者在1956年1月10日“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原稿有删节，本文据《人民日报》社论编辑部整理。原稿标题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前途》，刊于《人民日报》，1957年1月1日。附注：

（一）语言的模糊性。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特性，它在语言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试论语言的模糊性和明晰性

辜晓东

（二）语言的明晰性。语言的明晰性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特性，它在语言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引言

伍铁平同志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外国语》上发表的《模糊语言初探》一文，传播了重要的新的科学信息，读后颇受启发，特作此文。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最神秘的一种行为。关于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自古以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对此有过种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但是并没有发现语言的一个重要特性——模糊性。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科学，如模糊逻辑、模糊数学、模糊语言学等等。模糊语言学是以模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现在就要对它的科学价值作出全面估计，还为时尚早。但是这门科学的兴起及发展，将给进一步揭开语言性质的奥秘提供一把重要的钥匙，也将给人类认识史提出一种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的方向。

语言是由语音、词汇、语法所组成的符号系统。可以说，这些语言单位都具有模糊性。语言既具有模糊性又具有明晰性。语言是思想信息的载体，人们在交际中所要传递的信息是多种多样的。信息量有时多有时少，而且常常受到语境、情景等的制约，因而人们需要对语言单位作出适当的选择才能组成话语。这种选择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语言具有模糊性。语言的模糊性使语言成为人们手中最方便最灵巧的交际工具。人们说出的每句话必须具有可靠的明晰度，才能够达到互相了解的目的，因而语言又具有明晰性。语言的明晰性使人们的交际成为一种有效的行为。

二、音的模糊性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结构系统。把语音划分为音素和音位系列是语言学家研究的结果，一般人并不理会。音位存在于它的变体之中，因此音素和音位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绝对的界限，带有模糊的性质。例如，汉语兰州方言里[n] [l]不分，“脑老”、“难兰”、“泥犁”的声母既可以念成[n]又可以念成[l]，说话者可以自由选择。如果确定[n]表示这个辅音音位，那么[n] [l]都是它的变体，而这个音位和它的变体之间的界限显然是模糊的。汉语

普通话的[ɑ]、[A]、[ə]三个音素各有自己的出现条件，[a]可以出现在[-i] [-n]的前面（如“来”[lai]，“搬”[pan]），[A]可以单说或作开音节的单元音（如“阿”[A]，“拿”[nA]），[ə]可以出现在[-u] [-y]的前面（如“高”[kau]、“放”[fan]），它们出现的条件是互补的，不具有辨义的功能。如果确定[a]表示这个音素簇的音位，[a] [A] [ə]就是它的三个变体。音位[a]及其变体之间的界限显然是模糊的。这类事实表明，自然语言中音素和音位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它们具有模糊性。还因为音位及其各个变体在发音上是相似的，不但自由变体是相似的，而且条件变体也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就决定了音素和音位的模糊性。

这种现象在各种语言中是普遍存在的。例如，英语不送气的[p]，[t]，[k]出现在[s]和一个元音的中间，送气的[p']，[t']，[k']则不受这种条件的限制，如 spin [spin]，stone [stoun]，skin [skin] 和 pin [p'in]，tone [t'oun]，kin [k'in]。这里音素不送气/送气的差别不起辨义作用，所以不是六个音位，而是[p] [t] [k]三个音位，另三个是它们的变体，在书面上是不必区别的。初学英语的外国人常常将这种送气/不送气的差别混同起来，虽然不合标准英语的规范，却不易引起听话人的误解而影响交际，其原因就是因为音素和音位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音位的各个变体都具有该音位的区别性特征，而音位及其变体在语音特征上又是相似的，故而音位具有模糊性。音位是语音系统中主要的东西。音位的模糊性正是语音模糊性的表现。

在形态音位的变化中同样可以看到语音的模糊性。当两个声调相同的词连读时，就发生了形态音位问题。例如：两个上声字相连，前一个上声字变为阳平。如：“买马”⁰[mai]⁰[ma]，变成了c[mai]⁰[ma]，混同于埋马c[mai]⁰[ma]。在儿化时，词根语素的韵母中引起一套很复杂的形态音位变化。例如，发[i]和[y]这两个高元音，舌根是平的，跟卷舌音ə不能共存，必须加进一个卷舌的中元音，如“鸡儿”[tei][ər]，变成[teier]。韵尾[-n]是舌尖辅音，与儿化的卷舌要求相矛盾，干脆把[-n]丢掉，如“今儿”[tsin][ər]，变成[toler]。这样“今儿”跟“鸡儿”又混同了。象“小鸡儿——小街儿”，“柜儿——棍儿”都属于这种情况。

在语言中，还有音位组合单位彼此完全混同的现象，这就是所谓同音词。对汉语来说，同音词即声韵调完全相同，而意义完全不同的词。同音词是语言中音少义多造成的现象。汉语标准音的音节只有四百多个，加上四个声调的区别也只有一千多个。如果一个音节只表示一个词，那末汉语的词就很有限了。要运用这一千多个音节表达几万乃至几十万个词，除了大量发展复音词，必定还要用一个音位组合单位表示不同的意义。例如：勿必——务必——期终——期中、需要——须要——报复——抱负——图示——涂饰。由于汉字是不表音的文字，所以汉语中的同音词在书写形式上多数并不混同，可是在口语里总是模糊的。例如：“给病人喝什么汤？”“[tan]汤。”到底是无盐之“淡”汤，还是鸡“蛋”汤？这在听觉上是不容易分辨的，因而语音形式的模糊性造成了语义的模糊。这种现象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印欧语言中也是存在的。例如：英语的 ball(球)和 ball(午会)，是书写形式相同的同音词。德语的 Acht(注意)和 acht(八)，是书写形式不同的同音词。书写形式相

同的同音词，不论在书面语还是在口语中，都是模糊性的语言单位，若孤立地说出 *bail*，其意义是不确定的。可见，音位组合单位彼此完全混同而造成的同音现象，是语音模糊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活动，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语言的模糊性，是由于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活动，往往带有主观色彩，带有个人的主观感情色彩。因此，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活动，本应是客观的、科学的，但由于认识者自身的主观因素，如感情色彩、个人好恶等，就使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带有主观色彩，从而造成语言的模糊性。客观事物是复杂多样而又互相联系的，因而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活动以及所要表达的信息也是复杂多样的。人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往往出现认识的过渡状态，形成一些没有明确外延的模糊概念。语词是概念的表达形式，模糊概念只能用具有模糊性的语词来表达。

人们对有些事物或现象的性质、特征、形状和数量等，只须或只能说一个概率，为了表达这一类信息，在语言中就创造了诸如大概、大约、约莫、好象、似乎、一些、可能、左右等等没有确定外延的模糊性语词。就拿“左右”一词来说，它可以表示：将至身边的人或手下人，如“左右劝他息怒”；附近，如“左右邻居都来看我”；大约的数量或度量，如“全文两千字左右”；施加影响，使之改变行动态度，如“谁也左右不了他”。可见“左右”表示多种信息，离开具体的上下文很难精确地说出它的含义，即使在句子中（如我们所举的例子），含义虽然丰富多了，但它所表示的仍是不确定的范围、行为和数量。此外，高、矮、大、小、深、浅、胖、瘦、美、丑、善、恶等等所表示的概念也都没有明确的外延，模糊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语言中，许多表示时间的词和表示亲属称谓的词都具有模糊性。例如，黎明：天快亮或刚亮的时候；黄昏：日落以后星出之前的时刻，等等。这些都很难划出明确的时间界限，是一些模糊性概念^①。印欧语的亲属称谓中“哥哥”、“弟弟”常常用一个词表示，英语用 brother，德语用 Bruder，俄语用 брат，这是语词模糊性的表现。在汉语中“哥哥”和“弟弟”是两个词，是明晰的。但是“兄弟”一词所表示的概念则没有明确的外延，可以指“哥哥和弟弟”，也可以单指“弟弟”，可以用于“对年龄小于自己的男子的亲切称呼”，又可以用于“男子和辈份相同的人或对众人说话时的谦称”。这些都说明了词的模糊性。

语言作为人们交流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必须是丰富的，同时又必须是简洁的。语言的丰富性大体上与客观事物的复杂多样相适应，而语言的简洁性则与客观事物的复杂多样相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语言的经济原则和它所要表达的差不多是无限的信息量之间的不相适应。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语言往往打破客观事物或概念的界限，用同一个词表达不同的概念，这样就大大节省了语言单位而具有简洁性。语言是充当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词的意义不等于客观所指，因此词常常不必象客观事物或概念那样分明。这是词的多义现象，同义现象所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词具有模糊性的重要原因。

一个词往往有几个意义，因而造成理解上的模糊。例如，“状元”，本是科举时代的一种称号。清代称进士科及第的第一名，有时也泛指新进士。宋代主要指第一名，有时也用于第

① 可参看伍铁平同志《模糊语言初探》，《外国语》1979年4月。

二、三名，所以它本身就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元代以后限于称谓试用甲第一局，这似乎排除了模糊性！但是，它后来又产生了“在本行业中成绩最好的人”这样含比喻意义，所以又重新具有模糊性了。例如“算盘”，既指计算数目的工具又有“主意”的意思。这种一词多义的现象在任何词典里都是举不胜举的。这类词不但单独说出时你不知道确定哪一个更项为宜，就是在句子中（即获得了一定的语境）有时仍然是模糊的。例如“你打错算盘了”，既可以理解为“你的数目计算错了”，也可以理解为“你的主意打错了”。^①

普遍概念和集合概念，外延都很大，因而表示这些概念的词最具有模糊性。我们可以说，概念的外延越大，表示它们的词的模糊性就越强，概念的外延越小，表示它们的词的模糊性就相对地减弱。例如，“动物”是一个普遍概念，它的外延很大，可以包含鸟、兽、虫、鱼等以有机物为食物，有神经、有感觉、能运动这一类生物。“森林”是一个集合概念，通常是指大面积生长的许多树木。相应地，在语言中就有普遍名词、集合名词、形容词和动词来表达这样一类的概念。世间的动物很多，难以穷举，在多大面积上有多少树木可以称为森林，也难以划出明确的界限，因而“动物”、“森林”这两个词，虽然是具有模糊性的。^②

① 词的意义都是概括的。正如列宁所说：“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東西”。② 可以说，词的这一特性正是词的模糊性的重要根据。

② 例如“森林”这个词，从字面上看，是“森林”，但就其外延来说，却可能指一片森林，也可能指许多树木，也可能指一个国家的全部森林，等等。因此，这个词的外延是不确定的。

四、句的模糊性

句子是由词按照线性原则组合而成的序列，有一定的语音形式。语音和词的模糊性常常造成句子的模糊性。例如，“枕头”，如果“头”念轻声，则是词根加后缀的名词；相反，不念轻声，则是动宾结构，意思也两样。又如，“他走了一个钟头了”，可以理解为“他在路上走了三个钟头了”，也可以理解为“他离开这里三个钟头了”，这是因为“走”这一词有“行走”、“离开”两层意思。“我看不起歌剧”，“看不起”作为一个单位（词）看，是“轻视”的意思；作为动补结构看，是“买不起”的意思，这样，就有“我瞧不起歌剧这一剧种”和“我买不起歌剧票”两种不同的理解，句义是模糊的。“鱼吃了”，可能有两种含义，两种结构，理解为“鱼被猫吃了”，“鱼”是受事主语；理解为“鱼把鱼虫吃了”，“鱼”是施事主语。由此可见，句子的模糊性，不仅是句义的问题，也是结构的问题。

许多句子所表示的只是模糊观念的集合。例如“它有三十四层楼高”，这句话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准确的高度，而且每幢房子每层楼的高度又不统一，所以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些模糊概念的集合。还有些句子，看上去似乎是明晰的，但它的所表达的信息仍是模糊的。例如：“小明比小强高”，被比较的对象“小强”不一定高；“芳芳比玲玲美”，被比较的对象“玲玲”可能美也可能不美。可见，形容词用于肯定评价时被比较的对象不一定具有该特征，用于否定评价时，被比较的对象一定具有该特征。但是，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不能

① ② 见列宁全集第38卷302—303页。

使人得到明晰的准确的印象。

多义句式是句子模糊性的突出表现。粗略地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词的类功能的摆动造成句子的模糊。例如，“他跟你很好。”如果“跟”是介词或连词，是“他和你很好”，如果用作动词，意思是“跟着”，就是“他跟着你很好”了。“我和玲玲她们七个女同学一起去”，如果“和”是连词，七个里面包括“我”，如果“和”是介词，则不包括“我”。

“学习”、“调查”、“研究”、“分析”、“希望”等一类词的功能都是摆动的，具有动、名双功能。例如，“学习方法第一重要”，可以理解为“学习方法第一重要”，这里的“学习方法”是动宾结构；也可以理解为“学习的方法第一重要”，这里“学习”和“方法”是偏依结构（即一般所谓偏正结构）。

(2) 动词双向(施、受)性造成句子的模糊。例如，“赞成的是他”，可以有“大家所赞成的是他”和“赞成这个意见的是他”两种解释，因为“赞成”可以是施事动词，也可以是受事动词。“相信的是他姐姐”，可以理解为“他所相信的是他姐姐”和“相信某件事或人的是他的姐姐”，这也因为“相信”是个双向性动词。这种现象，是代表这类句子的抽象“句式”所固有的，并不是组成这些句子的那些具体的词的词义所造成的。因为若把“相信”换成别的近似的动词，如“反对”、“关心”等，句子的含义及其结构仍有歧解。

(3) 代词称指对象的摆动或隐位和某些副词关涉对象的摆动造成句子的模糊。例如，“我碰了头了”，可以有“我和某人见过面了”和“我的头和某物碰撞了”这样两层意思，就是因为代词“他”的隐位而引起“我”称指的摆动所致。如果改写成“我和他碰了头了”，就不会产生第二层意思了。“这话我都不懂”，副词“都”关涉的可以是“这话”，表示“这话我全不懂”，也可以是关涉句中的“我”，表示“连这话我都不懂吗？”含有不满之意。

(4) 主谓、动宾、偏依等结构的关系摆动所引起的句子的模糊。例如，“看见了学生的导师”，可以是动宾结构的“看见了/学生的导师”，也可以是偏依结构的“看见了学生的/导师”。“他吃小碗”，可以是“他用小碗吃”，也可以是“他吃一小碗”，这种歧解是动作和对象的关系摆动所引起的。宾语移位也会引起句子的模糊，例如，“这个人谁都不认得”。可以是“这个人不认得任何人”，也可以是“谁都不认得这个人。”如果把“这个人”移到动词后面宾语的位置上，就不会有歧解了。但是语法学界对类似这种现象的认识是有分歧的，由此也可看出这类句子的模糊性。

(5) 隐性语法关系引起某些结构的模糊。通常所谓主谓、动宾、偏依等结构的关系，有许多是明眼能见的，可以叫作显性语法关系；但是也有许多是在显性语法关系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种隐性的语法关系。例如，“出借图书”，作为名词性结构看，“出借”是“图书”的修饰性成分。不过在这种关系的背后还存在另外一种关系，即动作和受事的关系，因而“出借”和“图书”之间是动宾关系。“母亲的回忆”，其关系似乎是清楚的，其实不然，既可以看成是领属关系的“母亲自己的回忆”，也可看成是限定关系的“关于母亲的回忆”。

属于句法范围里的模糊现象，还可以列举许多。这种现象说明，不但语音、词汇存在模糊性，语法同样也存在模糊性。将来的模糊语言学着力于模糊句式的描写，对于揭

示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精细微妙的特质，概括出精确、普遍的规律性模式，大概是很有益的。

在本文第二、三节中，我们从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上考察了音位的模糊性。现在我们再从音位和音位的关系上考察音位的明晰性。

在本文第二节，我们论证了音位的模糊性，那是从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上加以考察的结果。从音位和音位的关系上考察，我们又发现音位具有明晰性，它取决于音位的区别性特征。音位的相互区别，依靠每个音位所具有的一些特殊的不同于其他音位的语音特征，即区别性特征。例如，汉语普通话的[*p'*]，是双唇送气清塞音，它与[*p*]相同的地方是双唇清塞音，不同的地方是前者送气而后者不送气，因此送气/不送气的特征使它们区别成两个音位。*[tə]*是舌面清塞擦音，[*c*]是舌面清擦音，两者差别是“有塞”与“无塞”，所以是两个不同的音位。音位的区别性特征构成音位之间的对立，互相对立的音位构成一种语言的音位系统。从音位的对立关系来看，各个音位都是不同的，都有鲜明的个性，并具有辨义功能，因而是明晰的。一般认为，音位系统是语言的语音体系的主要体现。故音位的明晰性也正是语音明晰性的表现。

和音位一样，词、句子的明晰性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主要有：(1)一定的语境(上下文)。某些音位组合在一定的语境之中只表示一个确定的词，一个词在一定的语境之中只表示一个确定意义；一个语法结构在一定的语境之中只具有一种确定的语法意义。(2)一定的情景(物质和社会环境)。在一定情境中，人们即使使用经济到最低程度的语言材料来组成自己的话语，由于受到情景的制约而达成了默契，这种话语可以获得一定的明晰性。(3)结构内外因素的制约。在句子内部，词与词之间，句子成份与句子成份之间，在语法特点和意义上都有互相制约的作用。词的逻辑基础是概念，句子的逻辑基础是判断；超句体的逻辑基础是思维的另一种更变原则的结构单位——逻辑统一体。超句体是指由一个个句子所组成的语段，而逻辑统一体则是指推理等思维单位。一个思维单位往往不是跟单个句子的界限相吻合，而是在一定的逻辑和句法联系的基础上，由一个逻辑单位转向另外一个逻辑单位，构成逻辑统一体，而语言则由一个句子转向另一个句子，构成超句体。正因如此，不但整段话语中所形成的结构线索这种内部因素，制约着句子，而且它所表现出来的逻辑线索和客观事理的线索这种外部因素，也制约着句子。这两种制约，使句子的结构和句子所表达的意义都具有单义性，从而获得了明晰性。

现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1) 在一定的语境中，语言单位及其结构的模糊性就会排除。例如，由于语音混同而造成的同音语素和同音词，在一定的语境中就发生了变化。“药”、“钥”、“要”[iau]是同音的，没有一定的上下文很难区别，可是在“药水”、“钥匙”、“要素”这三个复音词中是不会有什么模糊而造成理解上的差误。又如在“‘药’，护士边说边递过来”中，[iau]肯定不是“药”，而决不会是“钥”。

有些句子的结构关系也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得到明确肯定的描写。例如：

“快点炒蛋炒饭罢。十二点我要和他们会齐呢！”儿子却又来催促了。（茅盾《儿子去开会了》）

这儿的“炒蛋炒饭”，如离开具体语境，究竟是炒蛋/炒饭，还是炒/蛋炒饭，是不易确定的。然而在具体语境中，在上引的这段话之后，写了父母的对话，父亲的回忆，然后是儿子“在吃蛋炒饭了”，因此“炒蛋炒饭”的结构显然是炒/蛋炒饭，而不是其他。

(2) 在一定的情景中，交际的一方所说出的最经济的话语也能为另一方所理解，因为这话语所表达的意思具有确定的明晰度。例如，“三张‘桥’，两张‘梦’”，在情景外，似乎不可理解。但若是在电影院售票处，一边交钱一边这样说，售票员却完全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虽然你并没说出“我要买电影票，要《冰上的梦》”这是因为交际的双方对相关的人和事有着共同的了解，因而形成了默契。这种在交际时已具备的信息，在实际交际中可以省略。

有一些话语，离开一定的情景，词的惯用意义和词面意义的兼有会引起语义的模糊性。例如，邮递员说：“我走不过来”，这句话可理解成：(1) 前面有障碍物走不过去，是词面意义。(2) 投递户多，在规定时间里走不遍，是惯用意义。如果处于“在傍晚邮递员一边把信交给某人，一边说‘我走不过来’”的情景中，就肯定是(2)。这样就排除了模糊性，获得了明晰性。

(3) 一些句子的模糊性在结构内外因素的制约中得到消除。例如，a. 我去烙饼。b. 我吃烙饼。表面看来相似，但 a 句的谓语是连动结构，b 句的谓语是动宾结构。因为“去”是不及物动词，不能跟名词作宾语，所以“烙饼”在 a 句中只能是个动宾短语，和“去”组成连动结构；而“吃”是及物动词，可跟名词作宾语，b 句中的“烙饼”，作为“吃”的宾语而组成动宾结构。这里“烙饼”不会是动宾短语，“吃”的只能是某种物质，而不会是某种行为状态，这说明结构内外因素的制约对于排除句子的模糊性而使之获得明晰性有显著作用。

综上所述，语言的明晰性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而语言的模糊性，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条件的，也就带有了绝对的性质。模糊性和明晰性是语言的两个侧面，它们的结合，使语言成为人们最重要最有效的交际工具。

六、模糊性语言的功用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一个基本属性。对于精僻的数学语言来说，模糊性似乎是自然语言的缺点，然而作为交际工具使用的语言，模糊性恰恰是它的优点。

模糊性的语言有它的功用。它使语言单位具有选择性，因而自然语言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能够满足人类交际的需要。

许多情况下，人们在交流和表达的过程中所传达的信息，不要求精确，而是要求适度。模糊性语言正适应了表达的适度性要求。那就是指表达时所选择的语言和所要表达的信息程度相当，而不是完全切合。因此，人们常常选择模糊性的语言单位来组织话语，表达信息。例如：